

· 当代西方研究: 欧洲的扩张 ·

委任统治与阿拉伯世界反西方倾向的历史渊源

王三义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太原 030006)

摘 要: 当代西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全球范围遇到的最强烈的抵制来自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反西方倾向不是简单的反西方文明,也不仅仅是反抗美国对以色列的袒护和对阿拉伯人的弹压,而是一种历史与现实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产物。这种倾向的历史根源产生于委任统治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委任统治是变相的殖民瓜分,是对阿拉伯人的欺瞒哄骗。英、法分割阿拉伯地区,把不同的民族和教派划入同一个国家,也单独划出新国家;但又听任同一民族(如库尔德人)被划到不同国家;尤其是支持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导致阿、犹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英、法强行把肥沃新月地带诸国推入现代化轨道,但又没有认真解决阿拉伯社会问题,半生半熟、非西非东的政治制度更不利于中东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西方势力的威胁与阿拉伯世界长期的劣势地位,使阿拉伯人对西方强权心怀戒备。美国为首的强权国家又插手当代阿拉伯国家内政,触及了几十年前委任统治带给阿拉伯人的未能平复的旧创痛,使这种反抗情绪更为强烈。

关键词: 委任统治; 阿拉伯世界; 反西方倾向; 历史渊源

从英国霸权到美苏争霸再到美国主宰世界,无论霸主们的招牌如何变换,“西方大国插手和干涉弱国内政”这一当代国际事务的特征没有变化。那些终于获得独立的国家,西方大国无法插手;过于弱小的国家,完全被强权征服,由插手变为直接控制;而阿拉伯国家,既不至于完全被西方吞并,又不能彻底摆脱强权束缚,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其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并进一步成为全球范围内一个强烈抵制西方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特殊区域。当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谈发展、进步和现代化问题时,阿拉伯世界的人们还在祈求和平与安宁。在国际问题研究中,许多学者指出:阿拉伯世界的反西方倾向,本质上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支持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军事打压。一些学者也探究阿拉伯世界反西方倾向的根源,认为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有学者泛泛谴责殖民统治,但对委任统治一笔带过,只是简单地把它算在列强的一系列殖民侵略活动中。其实英法两国的委任统治才是造成当代阿拉伯世界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渊源所在。从委任统治范围的确定(1920年4月)到最后结束(1948年5月),将近30年时间,现代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均产生于这一时期;英法两国主持和操纵了这些国家的建立,划定了这些阿拉伯国家之间以及与邻国之间的边界,也埋下了几十年来边界冲突和领土争端的祸根;英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导致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生存权之争,酿成一次次的流血冲突。细究起来,当代中东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那些冲突、争端、矛盾、纷争,大多与委任统治有关。不从委任统治入手,恐怕难以揭示西方招致阿拉伯世界反抗的根源。

一、“委任”背后的阴谋与阿拉伯人独立愿望的破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英国很快出兵两河流域。不过,战事并不顺利,英军在库特受挫。英国在战争初期也从埃及派出军队,准备夺取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但英国军队并不能稳操胜算,必须争取阿拉伯人的支持,从内部瓦解奥斯曼帝国。为达此目的,英国与汉志的实力派人物谢里夫·侯赛因接触。按阿拉伯史书的观点:阿拉伯人担心英、法、德殖民主义者趁机从中渔利,影响阿拉伯人的独立事业,一战初期尚未完全站在奥斯曼帝国的对立面。“英、法唯恐阿拉伯地区落入德、土一方,便竭力拉拢阿拉伯人,承诺在战后给予独立自主权。”^{[1]528-529}

1915年7月,谢里夫·侯赛因开始与英国驻埃及—苏丹的高级专员麦克马洪通信。侯赛因提出的条件是:英国承认阿拉伯人建立一个版图包括北至陶鲁斯山、南到阿拉伯海的独立王国,取消外国的一切特权。经过考虑和协商,麦克马洪回信表示同意尊重阿拉伯民族的“自由”,条件是侯赛因同意向土耳其人宣战,阿拉伯的一切资源供协约国使用。此即《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侯赛因相信了英国人的许诺,于是号召全体穆斯林起来参加针对土耳其人的“圣战”。1916年6月侯赛因的儿子阿里和费萨尔在麦地那起义,驱逐了汉志的奥斯曼军队。随后,费萨尔挥师北上,配合英军攻打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军事行动的同时,费萨尔也派人去叙利亚,策动叙利亚人反土耳其。阿拉伯人发动的起义以及切断交通线、阻止德土军队南进的行动,使英国军队得以先后占领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等城市,最终控制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两河流域,英军于1917年3月攻占巴格达,1918年10月占领摩苏尔省的基尔库克。到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时,艾伦比将军统率的英军控制着肥沃新月地带¹大部分地区。“整个中东,除了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包括在内(被法国占领),其余都被认为是大英帝国的经济附属物。”^{[2]484-485}

英国最初还是想对肥沃新月地带实行军事占领,后来的形势表明单独吞并肥沃新月地带不可能,但英国仍不准备兑现对侯赛因的承诺。早在给阿拉伯人许诺时,英国就在与法国讨论战后如何瓜分肥沃新月地带的问题。1916年10月,英国和法国秘密达成《赛克斯—皮柯协定》主要内容是:大叙利亚(包括土耳其西南部、整个黎巴嫩地区、伊拉克北部)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伊拉克中部和南部、阿拉伯半岛、约旦河东岸由英国控制,对巴勒斯坦实行国际共管。为了得到其他列强支持,英国许诺把安纳托利亚划给意大利,让俄国获得对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这个秘密协定除了英法两国外,只有俄国知道,阿拉伯人和谢里夫·侯赛因被蒙在鼓里。由于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公布了《赛克斯—皮柯协定》的内容,阿拉伯人才如梦初醒。侯赛因要求英国高级专员作出解释,被英国人找理由搪塞过去了。

除了秘密协定外,英国还背着阿拉伯人,于1917年11月发表了《贝尔福宣言》答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这对阿拉伯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英国人辩称:建立“民族之家”不是建立犹太国家;而《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继续有效。于是侯赛因再一次表示相信英国。英国实际并不赞同阿拉伯人独立,更不希望阿拉伯地区统一。战后阿拉伯人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但巴黎和会没有考虑费萨尔率领的阿拉伯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只在最后时刻勉强通过了派四国调查团赴叙利亚实地考察的建议。其实,巴黎和会上专门讨论了巴勒斯

¹ 范围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地区,因该地区形似弯月、土地肥沃而得名(英文名:the Fertile Crescent Areas)。

坦和协约国军队占领的其他阿拉伯地区的前途问题,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会议,对巴勒斯坦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并与英国代表一起磋商了《委任统治书》的条文。但协约没有让人口占巴勒斯坦90%以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参加讨论,也没有就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条款征求他们的意见和看法。^{[3] 89}问题还不止于此,1920年4月,英、法等国在意大利圣雷莫签订协定,具体划分了英国和法国在肥沃新月地带的势力范围,奠定了两国委任统治的基础,即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归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包括约旦河东岸地区)归英国。后来所谓国际联盟颁发《委任统治书》(1922年),只是形式上做了“合法化”的表演,真正的委任统治开始于1920年《圣雷莫协定》的执行。法国迫不及待地用武力驱赶了费萨尔和他率领的驻守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军队,使得这位“拟议”中的叙利亚阿拉伯国的“国王”失去了基本的根据地。

1920年6月的阿拉伯反英起义迫使英国考虑新的殖民方式。英国决定给予伊拉克形式上的独立,选择亲英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作为伊拉克国王的人选,建立听命于英国当局的阿拉伯人政府。英国最终选择了费萨尔。1921年8月23日,巴格达举行了费萨尔加冕仪式,现代伊拉克的哈希姆王朝诞生了。英国驻伊拉克的高级专员考克斯极力笼络伊拉克保守的封建主阶层,成立了临时国务会议。国务会议以巴格达市纳吉布家族的阿布杜勒·拉赫曼·盖拉尼为首,各部部长主要是旧官僚、旧议员、部落领袖和宗教领袖(以逊尼派为主)。^{[4] 177}在巴勒斯坦地区,英国一手操纵了把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单独划出来,不准犹太人进入,成立受英国支配的外约旦王国,把侯赛因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推上国王宝座(1923年外约旦艾米尔国正式建立)。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从1917年起就陷入犹太人移民和建国活动导致的愈演愈烈的阿以冲突的泥潭。

其实,英国所谓支持阿拉伯人独立,是为了换得阿拉伯人反对土耳其人的统治,战时站在自己一方。英国不支持侯赛因的阿拉伯统一计划,是因为阿拉伯的统一将使英国失去在中东的既得利益。所谓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为在战争结束后单独控制巴勒斯坦找理由,抛出《贝尔福宣言》,含有明显的排斥法、俄、美的意图;委任统治期间,英国又限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活动,是因为犹太人的行动严重威胁到英国的利益。所谓与法国共同“管理”阿拉伯世界,只是调和了利益冲突,是“有条件”妥协的产物。英国在中东唱主角,法国是配角。肥沃新月地带阿拉伯人则是最大的受害者。阿拉伯半岛虽不是英国和法国的委任统治区,但沙特家族的获胜和侯赛因家族统治的覆灭,英国在背后起了作用。沙特阿拉伯王国1926年建立后,历史上阿拉伯人追求的“阿拉伯统一”彻底化为了泡影。阿拉伯人“独立、统一”的愿望破灭后,还能继续相信英国和其他列强的“支持与帮助”?几十年后还能相信美国攻打阿拉伯主权国家是为了阿拉伯的“民主和自由”?

二、英国和法国操纵下的边界分割与阿拉伯国家间的领土争端

英国官员们把他们主宰的战后阿拉伯世界任意分割,极为武断,建立伊拉克王国就是一例。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三省是差异很大的三个区域。北方的摩苏尔省是山区,经济上与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的联系紧密;中部巴格达省是定居农业的核心地带,贸易方面东与伊朗,西与汉志、也门有紧密联系;南部巴士拉省面向波斯湾,与印度等国有贸易联系。把这三个省拼合到一起组成一个国家,显然不顾它们的经济和民族差异,这是造成后来伊拉克国家政权建设中许多障碍因素迭出的根源。^{[5] 204}关键是,在肥沃新月地带除了混乱状态的巴勒斯坦外,当时形成了伊拉克、外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几个国家。于是面临着许多条边界

的划分:伊拉克与外约旦之间的边界、伊拉克与土耳其、伊朗之间的边界,外约旦与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边界,叙利亚与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的边界。伊拉克建立后,摩苏尔的归属尚不确定,直到1926年才与土耳其签订协议,划归伊拉克。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边界、伊拉克与伊朗的边界划定,都是体现了英国意志却不能反映当地人民的意愿,也不顾及历史上形成的天然界限。

英国策划建立外约旦埃米尔国,主要的考虑是:让阿卜杜拉管理从巴勒斯坦分出的外约旦,就不需直接派驻军队去维持这里的局势,可以减少英国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两地的军费总开支,减轻财政负担;鉴于谢里夫家族在中东的影响,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容易控制外约旦的阿拉伯人;支持阿拉伯人管理阿拉伯人,也是向当地民众表明大英帝国“以真挚、诚实、耐心和决心来履行战时的诺言”^{[6]184-185}。真正的意图则是在英国和法国的委任统治地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在英国人的战略中,不管有无阿卜杜拉,都必须在这里建立一个缓冲政权,或建立一个类似的政治实体来控制局势。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国在伊拉克、外约旦的间接统治,比法国在叙利亚的统治遇到的麻烦少一些,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外交政策有远见,关键在于,英国不想再背上“直接统治”的沉重经济负担。^{[7]86}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是英国政府的工具,但不可否认,它为外约旦提供了安全保障,保卫了巴勒斯坦、外约旦、伊拉克的边境,阻止了来自境外沙特部族的侵扰。巴勒斯坦本来是英国连接埃及和印度的“大陆桥”,也是英国从地中海往波斯湾运兵的通道^{[8]133-142}。而外约旦的建立,直接把巴勒斯坦和伊拉克连接起来,这对英国极为有利,但给当地留下无穷的遗患。

正因为外约旦是英国有意“制造”出来的一个国家,所以外约旦的边界划分带有更大的随意性。本来巴勒斯坦范围是模糊的,约旦河以东的巴勒斯坦究竟有多大面积?没人能说清楚。外约旦政权建立初期,阿卜杜拉的权力范围仅限于安曼、卡拉克以及北部若干城镇,还有靠近汉志铁路的贝督因部落地区。外约旦南部的亚喀巴和马安尚属于汉志侯赛因国王的范围。外约旦与叙利亚、外约旦与沙特之间的边界均未划定,而交界地区是冲突的多发地。1921年至1926年之间,阿拉伯半岛上伊本·沙特政权和侯赛因政权展开激烈争夺,最终于1926年分出胜负,侯赛因政权垮台,沙特家族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在这期间,英国撮合汉志国王侯赛因的代表于1925年6月与外约旦的代表签订条约,把亚喀巴和马安并入外约旦;紧接着指使外约旦军队占领亚喀巴和马安。12月,英国派前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克莱顿与伊本·沙特签订了《哈德条约》和《巴霍尔条约》。根据《哈德条约》把联系内志和叙利亚的草原走廊让给外约旦;根据《巴霍尔条约》英国取得“解决内志和伊拉克边界冲突的仲裁权”。^{[9]111-113}1926年7月,伊本·沙特被宣布为“圣地护主”,正式成为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君主。但是,伊本·沙特没办法从英国手中把亚喀巴和马安等地收回,几次交涉未果,无可奈何地放弃努力,意味着承认了外约旦对亚喀巴、马安和直至锡尔汉涸谷的东部沙漠地区的主权。所谓的“外约旦疆界”,实际上是在英国操纵和支持下,由阿卜杜拉对阿拉伯半岛北部的土地和属于叙利亚范围的土地尽力圈占的结果。

法国委任统治叙利亚之后,主要的措施是从叙利亚分出黎巴嫩,构建独立的政体。法国把叙利亚划分为四部分:大黎巴嫩、阿勒颇(包括亚历山大勒塔)、拉塔基亚、大马士革(包括南部的德鲁兹山区),允许各自组建地方政府。^{[10]434}黎巴嫩原来只是叙利亚的一部分,法国委任当局人为地分出一个新的大黎巴嫩,即以贝鲁特为中心城市,向北向南,把包括的黎波里、西顿、提尔在内的沿海地区和比卡山谷以及巴勒贝克划在一个区域内,等于扩大了原有的黎巴嫩州。旧黎巴嫩州从1861年以来作为一种自治状态存在,有一个选举出的中央行政会议,由马龙派、

德鲁兹派、基督教正教派、马塔维拉派和伊斯兰逊尼派议员共同组成。法国用扩大这个地区的办法,改变了该地区的人口比例,增大了逊尼派穆斯林人数,使基督教徒只在全民中略占多数,并有意识地降低了马龙派的地位。^{[2]525-526}黎巴嫩从叙利亚分离时,疆界划分都是由法国人一手操纵,尤其把穆斯林人口较多的地区划入黎巴嫩,符合法国殖民统治的需要,但留下的基督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一直延续至今。此外还有边界问题涉及的领土争端。叙利亚的东部和南部边界(即与伊拉克和外约旦的边界)是英国出于自己的利益,站在伊拉克和外约旦的角度划定的,尽管与法国商定和妥协,但英国是主宰者(即使是英法两国协商,也完全违背国际原则,“受任国”无权随意划分“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北部边界的划定也是复杂的:法国一直谋求把亚历山大勒塔划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委任统治初期叙利亚的确占据着亚历山大勒塔,只是后来形势的变化和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才划归土耳其领土范围。委任统治时期划定的这些边界,基本上奠定了阿拉伯国家之间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正因为边界是按照英国和法国的意愿划定的,当地人民的意愿没有得到尊重,而委任统治下的阿拉伯国家没有独立主权,所以,既留下后来这些国家之间的边界和领土争端,也留下民族矛盾和教派争端等隐患。比如库尔德人被划分到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四个国家;原来的黎巴嫩是一个基督教徒集中的地区,但法国故意扩大范围,把穆斯林生活区划入大黎巴嫩,造成教派对抗。美索不达米亚中部生活的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而南部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他们与伊朗西南的联系远比与巴格达的联系紧密,与北部的库尔德人更是互不相干,但伊拉克王国就是把这些缺少传统纽带的地区覆盖在一个政权之下。总之,20世纪后期发生的许多问题,如库尔德问题、伊拉克内部的教派和民族冲突、黎巴嫩内战、伊拉克和伊朗的边界争端等,都是由于委任统治埋下了祸根。

三、英、法推行西方政治制度的后果与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困境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阿拉伯地区似乎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一种趋势是西方经济的主宰地位逐渐扩大、增强、巩固;另一种趋势是促使西方放松政治控制的各种力量不断发展。20年代早期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局势是:除了伊拉克、外约旦和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区,叙利亚和黎巴嫩是法国的委任统治区外;英国对埃及控制继续加强;英国已经把波斯湾地区的部落酋长领地纳入自己“保护”之下,除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外,英法控制了东起波斯湾西至利比亚(意大利控制)的广大阿拉伯地区。英、法从欧洲20世纪的需要出发,在阿拉伯地区推广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英法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联系,形成新的依附关系。^{[11]12}

英国、法国在中东的殖民政策实践上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英、法两国总是试图与当地大地主尤其是那些控制广大农村地区的谢赫结盟。例如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许多地主都是参与阿拉伯起义公开反对英国和法国的,但他们还是英、法寻求支持的主要对象。因为,这些新建立的国家在20年代引进选举制度,英法委任当局要依赖这些人驾驭农村地区的选举,并把他们选进议会。作为条件,大地主们被给予许多特权,如免税权、向农民征收地租的合法权利等。其二,殖民经济管理上实行特殊模式。例如,即使委任统治地没有偿还能力,英法还得设法平衡其财政预算,使其仍能在特殊环境中自保。问题在于,这些扶持起来的国家往往经济困难,财政上的外援毕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开支上又要把安全问题放在首位考虑,所以用于公共建设项目如公路、铁路、港口、灌溉的资金少之又少。这样一来,委任统治地也就必然受一种特殊的财政和货币制度的支配。^{[12]15-16}当然,英国和法国的统治方式也有不同,英国在伊拉克和外约旦实行间接统治(巴勒斯坦是特殊情况),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实行直接统治体制。在法

国殖民者看来,“法国所创造的文明是最优秀的文明,法国人应该把法兰西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因而主张殖民地与法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一致,土著居民应通过受教育而接受法兰西文化,最终自然同化为法国公民。”^{[13]209}不过,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实际情况有差异,法国的统治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

与英国帝国主义海外殖民的历史相比,英国在伊拉克的占领和统治是短暂的。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英国的持久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快、加大和加深伊拉克现有统治方式下的现代化步伐,通过开发石油资源,为伊拉克提供了财政收入,促使和加速了伊拉克经济的发展。二是使伊拉克行政管理实现阿拉伯化。三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生,该运动的领导人被英国人赋予权力,他们在现代伊拉克形成过程发挥了比英国更大的作用。”^{[14]21}其实伊拉克的发展前景并没有那么乐观。英帝国主义主宰伊拉克,把伊拉克纳入西方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对伊拉克社会和经济的的确带来大的转变:现代伊拉克的国家机器、社会经济被整合到世界经济中;普遍存在的游牧和自给自足的农业,已逐渐向着满足英国的印度殖民地和欧洲市场需求的方向转化;几十年后,谢赫和游牧民的关系也转化为地主与农民或农奴的关系,土地转化为谢赫、城市商人和政府官员们的私有地产。^{[15]60}随着这种转变,英国在伊拉克的殖民政权被国家政权所取代。然而,在伊拉克建立的不是代表伊拉克民意的政权,它只是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现代伊拉克国家的建立,是英国资本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的产物,根本不是适应伊拉克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

还必须看到,英国把伊拉克和外约旦强行推入现代化的轨道,把英国的观念和制度移植到伊拉克和外约旦等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问题是这些强制推进和改造并不彻底,英国没有花大功夫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改造当地原有的制度。当英国看到无利可图时,会放弃原来的制度建设计划,不去花费太多心思和精力。其结果,只能做成“夹生饭”。法国委任当局像英国一样,也很少努力去改变当地经济活动的模式。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关税征收无一例外是为了提高国家收入,实际上社会福利和公共工程投入很少。直到1934年才考虑增大公共工程预算,尤其是公路建设和贝鲁特码头扩建。法国委任当局经济管理的基本手段是,把海关税收收入放进单一的预算并形成制度,由高级官员直接负责,然后在各部门之间分配,也用于为法国人拥有的公司提供资助,使其垄断铁路、城市有轨电车、电气等行业。像英国一样,法国也实行农业税改革,配套的措施是进行普查,颁布土地法令,确定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在确立个人所有权时,基本上没取得多大进展(尤其在叙利亚中、南部地区)。^{[16]65}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也是做成了与英国一样的“夹生饭”。

委任统治时期确立的是半生不熟的民主与现代法制框架,这种架构,使中东不能回到伊斯兰法,也不能转换为完整的现代法制体系。在战后非殖民化进程迅速发展之时,英国间接统治的负面影响便充分地暴露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通过间接统治所保留下来的传统社会及其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使这些殖民地在独立之初便埋下了社会长期分裂动荡的种子,从而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13]72}

四、西方大国的武装欺凌与阿拉伯人对西方强权的心理戒备

尽管西方文明的冲击早就开始了,法国和英国的战舰从18世纪晚期就已经到了东地中海,但真正把中东社会带入与西方社会直接联系中的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试图抗拒西方的奥斯曼帝国,竟然参加到德国和奥匈帝国一方卷入世界大战;英国和法国长期抵制俄国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但大战一开始,不仅自己的军队直接进入中东,而且将俄罗斯军队也引入土耳其

的海峡区;麦加侯赛因号召阿拉伯人向土耳其人宣战,发动起义协助英法,实际上等于是帮助英法占领自己的领土。到一战结束时,中东与西方的“联系”出现新的特征:一方面,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主宰了中东大部分地区;另一方面,西方的观念涌入中东,中东后来社会经济改革的努力基本上依赖于这些西方观念。随着西方士兵进入中东,现代作战方式、现代的军事和民事管理方式也被带到中东。伴随着军事征服活动,西方文化中与东方有差异的因素首先给那些奥斯曼士兵留下深刻印象,除了军事方面的影响,部分土耳其官员也接受了一些西方观念,使中东的社会、政治事务也烙下了西方文化的印记。这种意识形态和实践中的影响,在20-30年代的改革中就已显示出来。^{[17]165}当然,我们也不能高估西方观念的影响,因为,进入中东的西方观念并没有完全变成中东社会的财富,只是被部分知识分子和各阶层领导者群体所接受,而不是为全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在中东社会,战争带来的变化远比观念的变化明显。无论是西方观念,还是战争影响,共同促使中东社会形成追求政治独立以及未来发展尤其是走向现代化的意识。^{[17]166}

问题的症结在于,西方人是带着事实上的物质优势和心理上的优越感进入中东的。“在多数西方人看来,中东代表一种正在衰落的文明,这里的人民头脑简单,这里的政府涣散、不能有效地处理现实问题,这里的文化和制度没有可取之处。西方不仅有权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开发这块地方,而且有义务用西方的高级文化改造这一地区。”^{[18]9-10}对西方的“恩赐”态度和随之而来的侵略,中东的反应是充满矛盾的。因为没办法采取有效的抵制,本能的反应——生气和愤慨在最初就转化成两种倾向:无主见的功利主义者表现出媚外;有眼光者决心模仿西方侵略者的技术。这种情形促成了针对“西方问题”的“古典式的中东行为类型”:驯顺的西方势力的代理人、民族主义—政教分离主义鼓吹者、伊斯兰复兴主义者。^{[18]10}这三种类型产生于奥斯曼帝国还没有丧失主权的时期,经历委任统治时期直到独立建国,他们仍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救国道路。

英国占领的前提是阿拉伯人的支持和配合,阿拉伯人支持英国的前提是英国许诺的“阿拉伯独立”。最终却是阿拉伯人多次受骗:英国把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划给法国,把巴勒斯坦许给犹太人。号称“世界第一”的大国竟然是如此嘴脸!这恐怕是英国留给阿拉伯人的最基本的印象。英国和法国的所谓委任统治,不外乎采用寻求亲西方的势力、用本地势力奴役本土人民的手段,包括法国的“分而治之”办法,这一切使阿拉伯人对西方大国和它们代表的文明的认识一开始就产生了自然而然的“偏差”:西方文明不管多么辉煌,本质上是掠夺者的炫耀。

现代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在委任统治时期发生的事件,对获得独立后各自发展的深刻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前面所说的边界争端和制度隐患,重要的还有对阿拉伯人心理上的影响。阿拉伯人也是拥有高度文明、悠久文化传统、建立过横跨三洲的阿拉伯帝国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的民族尊严,在20世纪以来寻求独立和统一的道路上,阿拉伯人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成就。然而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占领和委任统治政策,既阻断了阿拉伯民族正常的解放道路,也激起激进主义者“非常手段”的反抗,无论哪一方面都对阿拉伯国家后来的发展留下难以根除的遗患。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及英国多年占领的埃及,即使民族主义者中的精英们,也把精力投入到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中,没有机会和精力搞好基本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他们反过来又成为普通民众批评的对象。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有目共睹的。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根本的一点是当时没有考虑到阿拉伯人的利益,只考虑到对英国是否有利。正如阿诺·古兰的论断:“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殖民主义,但它向巴勒斯坦移民定居,并推行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实践活动,方式和后果与欧洲殖民主义没什么两样。而且,没有帝国主义支持,犹太人不可能建立独立国家。为了获得英国统治者支持,魏兹曼等领导人曾向英国

表示,犹太人愿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服务,替英国在巴勒斯坦建立正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罗德西亚一样的白人定居者的社会。犹太复国主义某种程度上充当了‘非正式的’殖民主义角色。”^{[19]54}阿—犹冲突的扩大和最后演变为持续几十年的战争,西方大国不是没有责任。那些深受其害的阿拉伯民族由对英法的不信任,扩及对西方多数大国的不信任;由早年的反英倾向扩展到无处不在的反西方倾向,都是屈辱和怨愤积成的创伤。这种屈辱和怨愤中,有强烈的民族自尊,也有无可奈何的自卑以及对西方强权的心理戒备。委任统治时期阿拉伯人多次掀起反英起义,但每次都被英军武力镇压;当代阿拉伯人虽有反美反西方的意识和倾向,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基地就建在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上,阿拉伯人哪有表达他们不满情绪的可能性?如果讲历史的“相似性”,美国的做法与英国当年的做法多么相似;今日阿拉伯人的处境与委任统治时期多么相似!对阿拉伯人来说这一系列来自西方的干预,无论其合法的借口是什么,客观上只能是“旧恨”添“新怨”。

五、结 论

当然,阿拉伯社会动荡和经济落后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委任统治的恶果。但是,将当前阿拉伯世界的反西方倾向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文明冲突,即阿拉伯世界反西方的本质是反西方文明的想法却是值得商榷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阿拉伯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确有冲突,但作为意识形态的冲突无论多么剧烈,其影响范围毕竟是有限的;况且,基督教新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宗教,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具有较强包容性的文明;阿拉伯人没有抵制西方文明中先进、合理的因素,西方文明也没有否认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价值。可见“反对西方文明”的看法并不准确。同样,也不宜无视历史而只看到阿拉伯世界反西方倾向的近因和直接原因:美国一直支持以色列、袒护以色列,而对阿拉伯人实行打压,所以,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着反美反西方的倾向。从现状来看的确这样,但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阿拉伯世界的反西方倾向是一种历史与现实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产物。这种倾向的历史根源产生于委任统治时期,当代中东的矛盾和问题,大多能在西方委任统治时期找到根源和症结,委任统治造成的影响根本无法在短期内消除,而目前中东问题也就难以用任何一种简单的方式或政策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 [1] 纳忠. 阿拉伯通史: 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 [美] 费希尔. 中东史: 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3] 杨辉. 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4] 黄民兴. 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5] William L. Cleveland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Oxford: Westview Press, 2004
- [6] Timothy J. Paris *Britain, the Hashemites and Arab Rule, 1920 - 1925*. London: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3
- [7] Boy R. Andersen, Robert F. Seibert, etc. *The Politics and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87
- [8] Jill Hanilton. *God, Guns and Israel: British,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Jews in the Holy Land*. Stroud: Sutton Publishing Gloucestershire, 2004
- [9] 王铁铮. 中东国家通史·约旦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0] William Ochsenschald *The Middle East, A History*. Boston, Mass: McGraw-Hill, 2004

- [11] Abbas A hasraw i *Arab Nationalism, Oi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pendency*. London, New York Westport Press 1991.
- [12]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13] 高岱. 殖民主义概论. 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 1997
- [14] Phebe Marr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Oxford Westview Press 2004
- [15] Berh Berbergh *Tum oil in the Middle East Imperialism, War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 [16] Roger Owen Sevket Parnuk *A History of Middle East Econom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ictoria House 1998
- [17] Z Y. Hershlag *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Leiden E. J Brill 1980
- [18] Alan R. Taylor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9] Kevin R. Cox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②*.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Western Colonial Mandate and Historical Origins of Arabian Anti-West Tendency

WANG San-y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strongest resistance against Western values and way of life comes from the Arabian world. The Arabian refusal to the West is never a simplistic hostility to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or America that has been supporting Israel and suppressing Arabs, but a complic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This anti-West tendency originated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Mandate", which was virtually colonialistic occupation by Britain and France. The arbitrary territory carving-up by the colonialists resulted in the fact that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religious sects were grouped into one state, on the other hand, a nation (as Kurd) was partitioned into different states. One of the worst measures was immigrating Jews into Palestinian areas, which triggered off a survival struggle between Arabs and Jews. While Britain and France imposed Western modernization on the Arab states in the fertile crescent areas, they ignored the solution of social problems. As a result,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neither Western nor Eastern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in the Middle East community. Due to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menacing West and the disadvantaged Arab world, the Arabs are always on their guard against the Western powers. In a word,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sh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old traumas of "the Mandate" in Arabian hearts, which are repeatedly hurt in the interference of Arabian affairs by America and other Western powers.

Key words the Mandate; the Arabian world; anti-West tendency; historical origins

(责任编辑 赵枫)